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介绍

陈红民

美国所收藏与民国史有关的资料,如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宋子文等人的档案、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等是学术界所共知并广为利用的,而藏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国民党早期重要领导人胡汉民的一批私人往来函电手稿,知之者却甚少,这也是研究民国史和中国国民党史极为珍贵的资料。

收藏于燕京图书馆善本室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原由胡氏后人珍存,屡经战乱而未散失,经燕京图书馆吴文津馆长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六十年代中期获其捐赠,使珍贵史料适得其所。

“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主要收录了胡1931—1936年间与各方来往的函、电2500多件,捐赠前已初步裱贴,装成41册。除少数外,大都是胡汉民致他人的函电稿和各方致胡函电的原件。收件或寄件者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重要人物,包括蒋介石、汪精卫、孙科、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宋子文、孔祥熙、王宠惠、于右任、伍朝枢、何应钦、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方振武、林森、邹鲁、谢持、萧佛成、居正、邓泽如、蒋光鼐、蔡廷锴、宋哲元、韩复榘、龙云、刘湘、刘文辉、王家烈、杨虎城、何键、孙殿英、石友三、陈融、刘芦隐、杜月笙等等。其中还有胡汉民与日本首相犬养毅及松井石根等人的往来信件。

就全部函电稿的内容而言,“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涉及到三十年代初中国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对日和战问题,西南的半独立状态与各省政情,国民党的分裂,反蒋派的联合及内部纷争,1931年上海和平会议,孙科内阁的组建与流产,福建事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日本对西南的拉拢及西南的回应,南京政府对西南的政策,胡汉民1935年的欧洲之行及蒋胡再度合作的尝试,国民党五全大会的酝酿与波折,海外华侨的政治倾向,广东的政治经济状况等。许多函电往来者在函电中流露出其真实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往往与公开的文电有所不同),提供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细节,展示了风云会聚之际中国政治舞台上诡秘的派系纷争与人际关系。而全部函电稿所揭示的,是一幅胡汉民等在野政治家以两广为基地,以“抗日”“剿共”为号召,联合各地方实力派试图组织一场浩大反蒋运动的全景图。

象胡汉民这样对国民党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能有几封十几封的函电被保存供研究者利用,已属幸事。燕京图书馆竟能珍藏如此完整,数量庞大且时间相对集中的私人函电稿,是极为罕见的。它们不仅是研究胡汉民的重要资料,也为研究函电所涉及到的其他重要人物提供了全新的补充,更为研究三十年代中国政治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可能。仅举一例,胡汉民等在三十年代曾经秘密组织了“新国民党”,有学者甚至当事人出于政治原因否认此

一组织存在,而提出异议者囿于资料匮乏,找不出有力证据,因而成为有争议的问题。“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不仅有相当多的函电讨论推展“党务活动”及各地的“党务报告”,且更有胡汉民介绍李章达“入党”的誓词原件,足证历史上确实有此一标志着国民党分裂的组织。与此类似能填补以往历史事件或人物研究空白点或进行重新诠释的函电在“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中有很多。

从文物收藏与保管的角度看,如此众多重要人物的亲笔信札,本身即是一笔价值连城的财富。

由于与捐献者之间的约定及保管的需要,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尚未公开阅览(学者可向馆方申请阅读,但不许复制),且因为这批数目浩大的史料藏于美国哈佛大学,使一般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难有便利及充足的时间查阅。据称在笔者之前曾有少数学者浏览过,但尚未有人系统地阅览过这批珍贵史料,引用它们从事研究者寥若晨星。

笔者研究与胡汉民相关的课题有多年,略知燕京图书馆的珍藏,幸获1996—97年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资助,承吴文津馆长批准阅览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自1996年9月至1997年5月,经九个月艰苦工作,终得通读全部函电稿,并录入电脑,同时就便进行了断句与初步的考订。

二

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保持着捐赠时的原貌,未再细编目,有些凌乱。四十一册裱贴本的大小规格不尽相同,有的封面有标题或时间,有的则全无。从字迹、用纸和用词看,封面上的标题和时间有的是当初裱贴时所写,有的则似是后人所加。四十一册中有二十册是以每十册捆扎一包,共两包,另二十一册各自独立。为阅读及日后研究的统一与便利起见,笔者将它们按阅读顺序分别编成

“第一册”至第“第四十一册”

在统计各册的函电件数时,笔者遇到了难题:胡汉民常会在别人寄到的函(电)上随手写下拟复信(电)的全文或要点,无疑这些内容十分重要,可考虑到不能确定复信(电)是否确已发出,遇此情形,笔者均只作为一件计算。换言之,只统计来件,不考虑复件。所以,胡汉民的这批往来函电稿的实际数量,要远超过笔者所统计的二千五百五十五件。有些夹在各册中的纸片,虽是胡汉民亲笔,因无完整意义,亦未计算在内。

现即按笔者的阅读顺序,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各册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册至第十册被捆扎成一包,有一总的标题《胡致友朋电稿存底》。多数系胡汉民秘书王养冲的手迹(有的经胡修改),字迹较工整,估计应是由他抄录的胡汉民发出的信件、电报的底稿。

第一册共87件,函电稿时间为1931年10月15日至1932年8月。包括胡汉民获释至上海后及到港初期致广州非常会议各委员古应芬、李宗仁、陈融、白崇禧、林云陔、何键、石青阳、冯玉祥、犬养毅、方声涛、蔡廷锴、蒋光鼐及刘文辉等川系军人的函稿。其中胡在古应芬死后10月30日从上海致陈融的电稿中,已明确向广东方面表明“无论如何,弟与汪(精卫)绝不入京”、“迫某(指蒋介石——笔者)辞职并促制度上限制个人权力”等态度。12月29日胡汉民托驻粤日本领事转交致首相犬养毅的信中,以过去私谊要求他“毅然主持正义,凡所以为邦交障碍者,力谋救正。”

第二册共84件,时间为1932年8月至12月,包括胡汉民致翁秀民、邓慕韩、陈蔼士、陈济棠、林云陔、刘纪文、吴彦杰、李仙根、王慈和、谭文一、居正、黄善儒、李警云、林森、古巴同志社、美洲总支部、党史会、执行部、何康、邹鲁、余剑华、傅觉民、阎锡山、韩复榘、傅作义、杨爱源、石友三、林直勉、林翼中、王家烈、毛光翔、邓锡侯、杨森、田颂尧、龙云、蒋振等函。主

要涉及指导国民党海外组织,劝说西南将领联合及策动华北将领反蒋抗日等内容。在致党史编纂委员会的信中,胡就其所编《总理年谱长编初稿》指出:“其中错误颇多,有不容不加订正者”,并据个人亲身经历修订了两处错误,希望党史会能对孙中山年谱郑重其事,“不厌求详,博考周咨而订正之。”

第三册共59件,时间为1933年1月至4月。包括胡汉民致杨虎城、张学良、阎锡山、石友三、韩复榘、鹿钟麟、伍若泉、翁秀民、林义顺等的函稿,此一时期,胡汉民对联络北方反蒋势力颇为用心,在3月4日致陈济棠等西南政要的信中,胡汉民判断阎锡山等华北将领会有反蒋运动,要求两广“速简军北上,参加抗日”,以为呼应,同时在华北建立类似西南的军事组织,“须笼罩鹿、韩、阎、冯及东北各旧部”,西南应在经济、人才方面给予援助,并派人在军事、政治方面加以指导,“非如此无以贯彻我人对党对国之主张”。胡汉民与海外华侨的关系非同一般,这批函电中有相当大的数量是与加拿大、美国、古巴、越南、新加坡等地华侨往来,讨论在当地推展党务的。

第四册共75件,时间为1933年4月19日至6月26日。包括胡汉民致王家烈、但衡今、谢瀛洲、方振武、刘纪文、杨森、赵戴文等的函稿。方振武等在北方举兵抗日,并试图呼应西南,建立相应组织,胡对此十分支持,两人关系亦非同一般,往来函电颇多,日后方振武兵败流落香港,与胡来往甚密。此册中还有一些胡汉民感谢别人问病、代人推荐找工作或婉辞推介的应酬性信件,这类函电在全部函电中亦占一定比重。

第五册共62件,时间为1933年6月23日至9月,包括胡汉民致中央干部、叶夏声、刘湘、梁缉光、萧佛成、黄滋、驻加总干部、邹鲁、龙云、陈嘉佑、何健、但衡今、韩复榘、陆幼刚、杨虎城、冯玉祥、柏文蔚、杨熙绩及刘湘等西南将领的函稿。胡汉民有无建立“新国民党”,曾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册函稿提供确凿的证

据说明胡确实是“新国民党”的领袖。胡7月28日复中央干部(“新国民党”的特殊组织名称)函,指示对四川分部的人事安排,强调川分部“仍归长江干部指导及监督”,不可“直属粤干部”。次日,胡在批复加拿大总干部成立及申请经费报告时写道“知总干部成立,弥深欣慰,务期于此后精诚团结,领导同志为党奋斗……书记长一人亦望自行选定呈报,以利进行”,胡在信末自署为“中央干部主席”。

第六册共65件,时间为1933年10月至12月底,包括胡致萧佛成、邹鲁、陈济棠、于学忠、孙殿英、冯玉祥、何子佩、方鼎英、阎锡山、程潜、龙云、黄季陆、桂崇基、杨虎城、石友三、三藩市总干部、何世桢、张学良、王家烈等信稿。胡汉民对策动华北将领呼应西南十分用心,他于10月29日派何子佩北返,任“华北军事联络专员”,主要任务即是对华北将领“晓以革命大义,……俾能共同努力,改造华北,使南北一致,竟革命之功。”胡描绘了他理想的图景:一旦“华北将领之通电发出,组织成立,西南即树立党政中枢,正式宣告与卖国政府绝缘,并领导华北及长江之革命力量,声讨独夫,从事抗日”。

第七册共71件,时间为1934年3月25日至5月底,包括致西南执行部、邹鲁、赵恒惕、邓泽如、谢瀛洲、陈济棠、何健、杨其昌、曾杰、王亚樵、李宗仁、林翼中、孙科、区芳浦、陈融、孙殿英、驻美总支部、余纘庚、刘纪文、叶恭绰、刘芦隐、林翼中、胡英三、缪培南、林青山、萧佛成等函。在北方军人中,胡汉民与孙殿英来往函电甚多,曾给孙不少资助,关系颇密,他在4月致孙信中写道:“兄举义西北,虽未能尽如预期,然所部不辞艰险,牺牲奋斗,为革命效力者,实为我同志共感念,今整齐部队,力事准备,深信竟此全功亦迟早间耳。”

第八册共79件,时间为1934年1月至3月25日,包括胡给邹鲁、萧佛成、李海云、曾石泉、西南执行部、胡利锋、林云陔、陈济棠、张学良、吴佩孚、岳相如、黄麟、谢瀛洲、李宗仁、白

崇禧、宋哲元、阎锡山、杨爱源、陈渠珍、韩复榘、唐绍仪、焦易堂、陈融、孙科、叶恭绰、张继、柏文蔚、孙殿英等信稿。闽变失败，对胡汉民不啻也是一重大打击，策略上亦有所变更，他在2月23日给桂崇基、程潜等人的信中说：“对于近日形势，弟以为在政治上则不妨本避坚攻瑕之意，努力于反动政局之分拆，在各地地方则本实行均权制度之意，建立地方政治中心，以孤立反动政治势力。弟于此两者均经制定大纲，分途进行”。

第九册共99件，时间1934年6月至9月21日，包括致徐源泉、刘芦隐、《三民主义月刊》社、林森、缪培南、李宗仁、白崇禧、西南执行部、陈渠珍、邹鲁、刘湘、田颂尧、罗泽洲、唐绍仪、杨熙绩、陈辨惑、刘纪文、李烈钧、林云陔、李杜、刘文辉、龙云等。此时期胡汉民对“新国民党”指导甚多，他与邹鲁（“新国民党”书记长）之间的通信多与党务有关。《三民主义月刊》是胡汉民等人的重要喉舌，胡几乎每期都写长文发表，他对编辑方针也曾提出意见：“编辑方法微嫌沉闷，内容亦觉呆板，自第四期第一卷起应加改革。”

第十册共85件，时间为1934年9月至11月，包括致林云陔、于学忠、邹鲁、吕渭生、美洲及伦敦各总支部、萧佛成、林翼中、王家烈、犹国材、刘湘、林义顺、陈济棠、李宗仁、韩复榘、孔祥熙、邓泽如、蒋介石、汪精卫、何键、居正、冯玉祥等。当时，王宠惠、孙科携蒋介石信南下促胡入京，遭胡拒绝，胡在复蒋信中称：“自民国二十后久阙音问，亮畴、哲生两兄来，藉获手书，甚感关注……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视以前精力稍逊，诚为兄系念。弟以为国家大计，总理已垂示甚周，故数年来仍悉心体认而莫敢外。此次与亮、哲两兄所谈者，亦惟此旨”。此册中，胡致邹鲁的信中讨论到“新国民党”党务方面的缺陷：“中央对各地党务只有应付而无办法，对各地工作分配自始原无一定计划……致成组织散漫，纪律太宽”，认为“非改途易辙不可”。

第十一册至第二十册也被捆绑成一包，有一总的标题《胡汉民函稿手迹》。此十册全系胡汉民手迹原件，以行书草书居多，潦草难辨，信件几乎全是写给陈融的，用词极亲切与随便，信末基本无年份与月份。陈融，字协之，是胡汉民妻子陈淑子的兄长，是胡多年政治上的密友兼诗友，此时任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他充当了胡汉民与广东沟通的桥梁，胡汉民主要是通过他来了解广东政情及陈济棠的动向，并传达自己的意见，上海华北等地方的给胡的电报及胡的复札，也多由陈融来转达。胡与他们之间的通信，最能反映胡的真实想法。由于胡与陈之间的特殊关系，这十册应该是陈融收藏后交还胡家，甚至有关整批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全都是由陈融协助整理保管的可能性。为了保密（不仅防南京，还要防陈济棠），胡汉民与陈融间的信件多由专人传送，且信中所涉人物全都用了代号，加上往往只有写信的日子而无年月，比较难读，但就其内容言，这十册信价值极高。

第十一册共14件，全是胡给陈融的信。主要讨论应付福建事变及五全大会的办法。为对付南京召开五全大会的决定，西南使出许多手段，反对，拖延，或提出南京方面不可能接受的议案，胡汉民更提出仿四全大会前例，在广东召开另一个五全大会的建议，他说：“大会自动在粤召开，不由任何召集，更无从干涉。”至于会议代表，“人不求多，来粤不求其早，”甚至“不必招呼远地，而只由在粤之本省外省同志集会，已可充数而为全国之代表，且虑外来者不尽可靠与能听话，反为罗嗦”。

第十二册共22件，原封面有“胡汉民函稿手迹第二册（1934）”字样，但似是后人加上的。除一通广州转来天津致胡电外，全是胡与陈融讨论西南内部情势，指示对外联络方针等的信，其中如何应付福建事变及善后仍占相当比例。胡汉民等对福建方面的态度十分矛盾，当蒋介石以重兵攻闽之时，胡意识到若福建兵败，自己顿失屏障，故又反对南京用兵，希望保

全十九路军。胡向福建方面的代表提出,“须改换名目,归附西南,及择定地点”,则他可以收编十九路军。陈铭枢、李济深等迫于无奈,同意“取消一切组织,回十九路军本来,连属西南”。终因蒋介石用兵甚速,两方尚未商妥,福建已溃败。

第十三册共22件,原封面有“胡汉民函稿手迹(第三册)”字样,但似是后人加上的。其中多数为胡致陈融个人信件,亦有胡托陈融转交邓泽如、萧佛成、邹鲁等人的信或转发上海的电报,集中讨论对福建事变应取的态度。当时在广东的元老主张借机提出“请蒋下野”,而胡嫌此过于简单,提出“蒋汪下野,福建回头”的主张,他的解释是:“(一)可以示天下以公道;(二)可如不(指李宗仁——笔者)前电,释十九友一部份之热愤;(三)亦使桂与其他反蒋者同情于我……;(四)又必反蒋反闽,始符抗日剿共宗旨,而外交乃得特殊的信用。”胡将自己的主张写入了后来公开发表的《对时局宣言》中。

第十四册共22件,除两封分别由上海、天津拍致胡电及一封胡汉民致萧佛成原信外,均为胡致陈融信稿原件,时间多为1934年上半年。福建事变后,西南面临南京的压力更大,胡汉民急欲促成广东广西更确实的团结,特邀李宗仁到香港面商,他在信中写道:“不孤(指李宗仁——笔者)来港已晤,态度甚好。据言某兄(指陈济棠——笔者)亦确具决心,不比从前。至弟所虑其部下不一致,则不也甚虑之也。弟劝渠二人对内对外无大细,俱要一致。不孤甚以为然,目前即有对各省派人联络之必要,于派人时尽可同一封书,同署名字。”陈济棠与李宗仁相比较,陈更有实力,但李更接近胡的主张,与胡亦较亲近,这在许多信中都体现出来。

第十五册共21件,封面有“胡汉民函稿手迹第五册”字样,除一通由上海拍来致胡电外,全是胡汉民致陈融信稿原件。南京提出召开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胡汉民率西南政要公开发

出“齐电”、“有电”反对,该册信的内容大多围绕五全大会及西南策略,但当南京方面决定延迟召开后,胡又写道:“彼方(指南京——笔者)提议延会,深恐其即用对闽时之故智,记得当时有中全会再三展期,而一到十九路军被打破,则哲生等望其稍延数星期而不可得。蒋曾公开的说:‘闽变未定,西南有许多说话,闽既取得,即便寂然。’今兹必因布置未周或运用上尚无把握,故又欲延会耳。”表现出对蒋介石的极度不信任。

第十六册共22件,封面有“胡汉民函稿手迹第六册”字样,似是后人所加。该册全系胡汉民给陈融书信手迹,胡在信中与陈融讨论过争取外援,聘请外国顾问等问题,所考虑的国家有苏联、英、美和日本。胡特别强调在西南已有政务委员会和执行部两机构的基础上,建立军事组织——国防会议,他说:“弟所以主张由两广提召西南国防会议,即为对内对外预占地步。门神(指蒋介石——笔者)之为人,究竟不出欺善怕恶,我人既知一味敷衍示弱不能了事,即不能不提出政治外交等事,以攻为守,而提出国防可以作士气而得人心。”

第十七册共21件,封面有“胡汉民函稿手迹第七册(1934年)”字样,但似是后人所加。此册除两通由广州转给胡的两份电稿(由方振武发出)外,全是胡汉民致陈融信的手迹,其中多为广州内外政情及因应办法。邹鲁等因受陈济棠掣肘,诸事不遂心,执意离粤他去,胡劝阻,称“鸣翁(指萧佛成——笔者)、衣兄(指邹鲁——笔者)总以年内不离粤为好,我人既须整理党务一切,鸣、衣皆行,真等于散伙,我更无由应付内外。关于党的前途,真不可不虑也。”胡对通信的保密问题很重视:“从前密码承用已久,宜即更换新者,请属人注意。其旧来往电稿,亦须分别存废,大抵以少存为佳,切盼留意。”

第十八册共17件,封面有“胡汉民函稿手迹第八册”字样,但似是后人所加的。此册全系胡汉民致陈融信的手迹,写信时间大致为

1933—34年。福建事变发生后,胡汉民公开责难陈铭枢等,暗处却也有借机开府的盘算。他对陈融写道:“开府问题,不能不心血来潮,于是觉得开府地点是一问题。而第一步似以广西为适当,其理由有五:人心信仰(当地之人心与他省之视听)无复怀疑,一也;素无财富之名,则不必铺排,而各方来者易于应付,二也;因湘鄂吃紧,易于联络应援,三也;外交较易应付,不遽为红毛、矮子威胁,四也;敌用飞机袭击及闽中大军之使用俱不便,五也。”又写道:“此时定之似过早,然凡事豫则立,开府之着恐终不可少。”

第十九册共40件,封面有“胡汉民函稿(1933—1935)”字样,但似是后人所加。此册中包括胡致陈融函电稿、各方从天津、上海拍致胡电稿及胡托陈融转致上海李晓生、何世桢、陈群等电稿,时间上大致是1935年,其中有胡该年底从欧洲发回的数通电报。该册反映了胡与陈济棠之间的矛盾,及胡为寻出路派李晓生到沪宁去与南京方面谈判的情况。福建事变时,西南一无所为,胡迁怒于陈济棠:“西南局势已因某兄(批陈济棠——笔者)之迁延失机,弄成不讨O(代“蒋”字——笔者)而为O所讨之局,而内部又造成同床各梦,貌合神离。……故破坏西南局面,门神自是谋主,而某兄亦不能不负相当责任。事实俱在,来者难诬。”至于胡派李晓生到沪宁,因结果难料,胡在事情曝光后竟一味否认,要李声明入京为“个人行动,而无使命性质。”

第二十册共34件,封面有“胡汉民函稿(1934)”字样,但似是后人所加。此册包括胡致陈融、萧佛成等信及李晓生等自上海拍致胡汉民电报。当时王宠惠与孙科受蒋介石之托南下香港与胡晤谈,胡有数信向广东报告谈判经过及其立场,以释众疑。1934年底,何世桢等忽从上海向胡汉民报告,称可靠情报证明“蒋病不起,牙床溃烂,骨瘦如柴,昨吐血多,晕厥两小时。……据医生表示不过时日问题,难度立春。”要求胡立即北上,以便蒋死后收拾局

面。胡虽对此讯颇兴奋,并打算派女儿木兰去奉化“探视”蒋介石,以得究竟,但毕竟持重,未敢轻举妄动,只示以主张,要上海方面做应变准备。

从第二十一册起各册完全独立,即循笔者阅读时的顺序介绍,日后整理时或可根据内容将顺序稍作调整。

第二十一册共63件,原封面有“胡先生亲笔批注”。此册多系1932年至1934年间胡汉民所收到信件的信封,其秘书将来信要点写在信封上,而胡汉民也在信封空隙处批以复信要点(少数包括原信)。写信者为邹鲁、谢德臣、陈方度、蔡辉生、刘有莘、杨熙绩、陈昆山、曾石泉、伍若泉、方振武、赵公璧、裴鸣宇、曾伯兴、朱卓文、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广东支会会长等,内容颇庞杂。其中也有胡汉民致林云陔、林森、林焕庭、阎锡山等人的信,而最有价值者为胡汉民亲自介绍李章达加入“新国民党”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入党条例》。

第二十二册共105件,原封面有“胡先生函电稿,民廿、廿一年”题签。此册函电可分为两部分:其一是胡汉民在南京时期致王养冲、任中敏、刘汉英、刘芦隐、陈铭枢等人的函电,有一组(十三封)是胡汉民为给其兄胡清瑞治病延请医生的电报,反映出其兄弟情谊及对胡清瑞的百般姑息;其二是胡在1931年底及次年初在上海和会、孙科内阁及上海抗战期间的函电,如他在1931年12月15日发给粤方和会代表的电报中坚持以下数点:“一、主席一职应力持年高德劭之议,惟如此始免武力独裁,非仅为目前也;二、行政院长汪(精卫——笔者)、孙(科——笔者)二兄任属一人,弟均赞成,弟是以在野之身份为两兄之助,庶裨于党国;三、代表大会宣言及对于党政军之决议案,应坚持实现。”表明了坚定的立场。而在给蒋光鼐、蔡廷锴等的电文中,胡对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给了很高的评价。

第二十三册共104件,原封面有“胡先生亲笔函电及批注”题签,来往者有伍朝枢、陈

融、李晓生、李宗仁、陈济棠、林云陔、刘芦隐等。该册函电较庞杂,尚有胡汉民1927年4月16日开中央政治会议的亲笔记录,就是在此次会议决定两天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册中还有胡致日本人萱野、宫崎龙介、松井石根的信。不过该册函电主要反映的是1935年前后两广在与南京对峙多时后,寻求内外出路的情况,胡汉民等派陈中孚出国寻求外援、派李晓生到上海去与南京当局沟通。

第二十四册共126件,原封面有“胡先生廿四年游欧与各方来往函电、廿五年归国函电”题签。该册主要收录1935年下半年胡汉民赴欧洲养病及返国前后与各方函电往来,来往者有蒋介石、王宠惠、邹鲁、郭泰祺、孔祥熙、黄季陆、陈融、萧佛成、谢持、魏道明等。1935年下半年内外情势的变化,南京与西南的关系趋向缓和,国民党五全大会召开前,胡汉民以“养病”为名赴欧洲,但对国内政局仍有重大影响。此册函电中不少是各方报告五大会前后政情变化,敦促胡尽早归国主政,如魏道明在致胡电中称:“晤介公(蒋介石——笔者)转致展公各意,惟政局已改组,关于具体者觉暂不提为宜。介公对展公意见至为赞同,一切亟盼展、亮(王宠惠——笔者)二公归后面商。意至诚恳,并已另电速驾。孔、宋亦托速驾。”

第二十五册共115件,原封面有“胡先生来往函电(民廿二、廿三年)”题签。该册所收函电往来者包括陈融、陈汉光、蒋光鼐、蔡廷锴、萧佛成、西南执行部、何世桢、方振武、孙丹林、唐绍仪、柏文蔚、白崇禧、李宗仁、龙云、陈济棠、陈群、陈中孚、谭启秀、任援道、刘湘、陈言、李烈钧、李晓生、鹿钟麟、焦易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汪精卫、蒋介石等。其内容涉及西南联合、福建事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策动华北将领反蒋等事项。冯玉祥等在察哈尔起兵抗日,胡汉民支持甚力,及南京政府阻挠以至破坏,胡汉民曾致电华北阎锡山、韩复榘等,请其援助抗日义军:“当局之怯于对外,果于对内,实可痛愤。左右久与冯(玉祥

——笔者)、方(振武——笔者)诸部共患难,尤夙同情抗日,至期念民族危亡,迅为正义之主张,对冯、方诸部力予维护。”

第二十六册共59件,原封面有“陈协之先生致胡先生”题签。陈融致胡的信多是报告广东广西的政情发展及与各方联络结果等,特别注重报告陈济棠的态度,反映出胡汉民与陈济棠既互相利用,又彼此防范的复杂关系。此册信落款几乎无年月,从内容看大致是1933年左右所写。其中重要者为日本派人拉拢西南及西南的考虑,另有数信反映福建事变前粤、桂、闽三省合作的情况。

第二十七册共124件,原封面有“胡先生函电稿(民廿一年)”题签。该册收录胡致孙科、何应钦、刘芦隐、陈济棠、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张发奎、马超俊、邹鲁、冯玉祥、陈铭枢、何世桢、陈群、陈公博、薛子良、陈融、蒋介石、汪精卫、熊克武、李宗仁、曾伯兴、龙云、居正等函电,集中讨论孙科内阁、上海抗战、蒋汪合作复出后的策略及西南联合等事项。胡汉民等逼蒋介石下野后,推出孙科内阁,胡汉民期望甚高,一再为孙出谋划策,如劝孙“不问蒋即出与否,一切政策,如抗日主张、分兵剿共、成立执行部政委会等案,尽先提出,倘见阻挠,即总辞职。此政治家态度应耳。而得道者多助,则后易为。”未料孙科内阁无法应付急剧变化的内外情势,且也不听命于广东,很快在蒋汪的联合逼迫下解体。

第二十八册共56件,原封面有“胡汉民收各方来函(居正、刘文辉、鹿钟麟、杨虎城、田颂尧、孙科、阎锡山、刘湘、邓锡侯等),民廿二年”字样,但实际上所收信并非全是1933年的除上列名单,写信者尚有杨爱源、薛笃弼、杨森、石友三、柏辉章、庞炳勋、傅党民、任应岐、李家钰、冯祝万、孙丹林、焦易堂、傅启学、王家烈等。这些秘信多数由信使带达或由胡派去联络的使者带回,除问胡病情或表达敬意外,不少对胡的政治主张也表认同,抨击南京当局,用词亦甚激烈。如鹿钟麟在信中称蒋介石为

“独夫”：“独夫仍以剿匪为名，调其私人军队全部赴赣，以华北重任委之日事荒淫酒色之徒（指张学良——笔者），以有用之金钱饱无厌之私欲，而抗日将士则日在冻苦饥困之中而不顾。……瞻念前途，实堪痛心。”这类表示，与其公开场合的言论明显不同。

第二十九册共80件，原封面有“各方致胡先生函件，1931—1936年，张学良、叶恭绰、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方振武、王宠惠、李济深、熊克武、孔祥熙、林森、蒋介石、宋子文”等字样。除上列名单外，写信者尚有罗文干、马超俊、陈济棠、黄季陆、蔡廷锴、谭启秀等。信亦多系由信使送达，应酬问病者不少。值得注意的是福建事变后，李济深、蔡廷锴等或隐居乡间，或出洋考察，都与胡保持着密切联系，李济深早年在梧州受业于胡，故信中均尊称“展师”。该册中有蒋介石致胡的三封亲笔信，分别于1934年11月底由王宠惠、孙科，1935年2月由李晓生，1936年1月由魏道明转交的，表达与胡合作，请其入京主政的意愿。

第三十册共101件，原封面有“胡先生亲笔批注”题签。该册中的许多函电上有胡汉民的批注，或是指示复电要点，或对所来函电内容的评论。寄发函电者包括邓哲熙、何世桢、任援道、桂崇基、陈融、王彬（江致远）、陈群、郑先辛、陈纯斋、刘芦隐、石泉音（雷大同）、曹霄青、陈汉元、孙丹林、杨熙绩、蔡廷锴、邹鲁、松井石根等，其中邹鲁的信多讨论党务发展，反映出当时财政的窘况，他对胡叹苦经：“弟近来觉应付各方诸感困难，尤以经济为甚，弟日向人弹琴，不特使人厌烦，亦使弟太失人格，请以后关于经济一事另命人应付。”该册中另有胡致李宗仁、刘芦隐、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白崇禧、林焕庭、方振武、程潜、马超俊、任援道、何世桢、李济深、陈济棠、邹鲁、陈融等人的函电，其中一份《中国国民党党务进行纲领》，是“新国民党”的重要文件。

第三十一册共39件，原封面有“萧佛成先生致胡先生函”题签，所收全为萧佛成致胡汉

民信（若干封致陈济棠的信，是抄给胡看的）。萧系暹罗华侨，此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西南执行部委员兼海外党务组主任，他与古应芬、邓泽如、邹鲁等元老派同为胡的密友，听命胡在广州主持西南执行部的海外党务，并负责与陈济棠交涉各事。他的信很能反映西南内部，特别是元老派与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如陈济棠为打击元老派，策动民众与报刊攻击中山县县长唐少仪，酿成政潮，萧佛成为此专门给陈济棠一长信，责其不可，并向胡汉民抱怨说：陈“长此不变，花样无穷，吾人真难与共事矣。”

第三十二册共44件，原封面有“萧佛成、陈协之先生致胡先生函件”题签，其中前十七封为萧所写，余者为陈融所写。萧佛成所言多涉陈济棠态度的变化，陈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抗日讨蒋诸事一味敷衍应付，萧曾反复劝他，“讨蒋不但可以救国，亦且可以巩固其个人地位，苟非然者，闽、桂皆我敌人也”，陈一度表示，讨蒋已具决心，“但须待蔡（廷锴）、陈（铭枢）、李（宗仁）、白（崇禧）来粤共商大计。”事实证明，这种表示也是敷衍。陈融的信则反映广东当局态度的两面性：一面严正警告日本水兵在汕头登陆，并作好“实力制止”的准备，另一面又认为日本一部分实力派愿助西南倒蒋是一个机会，“万不可失之交臂”。

第三十三册共51件，封面有“胡汉民收各方函件，民廿三年，韩复榘、方振武、王宠惠、胡宗铎、李烈钧、桂崇基、冯玉祥、程潜、邹鲁、刘芦隐等”字样。实际上所收函件并非限1934年，除上述名单外，写信者尚有任中敏、何键、何世桢、陈策、阎锡山、黄其素、洪承点、陈铭枢、陈肇琪、邹鲁、杨虎城等。各信所涉事务甚杂，其中以方振武信值得注意。方于1933年9月报告，所属各部已建立“新国民党”的正式组织，“武已负常委兼组织部责任，并派遣登记合格同志分赴西北活动，”要求胡汉民给予经费，确定名称。次日，胡即以“中央”名义复电，允其组“西北执行部”，“经费已囑按月照拨”。稍后，方又报告，其全军已宣誓加入“新国民党”

第三十四册共49件,封面有“胡先生收各方来函,民廿四,方鼎英、李海云、许崇清、柏文蔚、杨虎城、石友三、谢持等”字样。实际上所收函件并非仅1935年,写信者还有邹鲁、罗翼群、冯祝万、汪啸涯、林青山、国民党驻安南总支部、区寿年、黄滋、陈炎生、袁世斌、陈杰、吴秀峰、李永耀、林义顺、黄志超、刘崇杰、郭泰祺、徐源泉等人。此册中有许多是胡汉民赴欧洲养病前后海外各国民党支部给他的信,或慰病,或促其归国主政。国民政府驻德公使刘崇杰、驻英公使郭泰祺等对胡也就便慰问照顾,且主动将外交部致各公使馆的秘件转示胡汉民(本册收录若干此类秘件),显示南京方面对胡的态度明显改善。

第三十五册共69件,封面有“邹海滨、刘芦隐先生致胡先生函件”题签。实际所收函件为邹鲁、刘芦隐与陈融三人致胡函。刘信有7件,大致涉及党务与宣传;邹信有42件,主要讨论党务,十分具体,包括组织结构、人事任命、经费分配等各项。另外也有数信谈到中山大学的建设及经费;陈融信20件,主要向胡报告西南联合的进展,粤、桂、闽三省军政巨头会商组织“国防委员会”和“对外贸易委员会”的经过。

第三十六册共132件,封面有“胡先生来往函电,民廿、廿一年”题签。来往者包括汪精卫、孙科、伍朝枢、刘芦隐、陈融、黄琪翔、林森、陈铭枢、邹鲁、邓哲熙、李文范、马超俊、傅秉常、萧佛成、陈济棠、邓泽如、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但衡今、甘介侯、何应钦、焦易堂、蒋介石、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右任、薛笃弼、何键、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等。内容涉及调解粤方四全纠纷,上海和会与逼蒋下野,孙科内阁的人事安排及内外政策,上海抗战,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对付蒋汪联合等等。胡汉民南下香港后,刘芦隐等在上海与各方联络,随时将政情发展报告胡,胡亦不时发出指示,影响政局。如胡在1931年底给孙科、伍朝枢、李文范的电报中婉辞立法院长职,并对“政治分配”提出如

下意见:“院部以粤人愈少愈好。而以弟复立法院亦有三不可:一、病躯不能任事;二、若弟入宁则违于分工合作之义;三、五院多半粤人,实示人以不广。故不如推觉生兄(居正——笔者)或慧生兄(谢持——笔者),而海滨(邹鲁——笔者)副之。至于监察仍以于(右任——笔者)为宜,若某(蒋介石——笔者)为之,则有随时推翻政局之可能,不如易以考试,望注意。”

第三十七册共52件,封面有“陈协之先生致胡先生函”题签。该册全系陈融致胡函,用词直率,议事详细,有时大段照录他人原话(也显琐碎)。内容涉及粤、桂、闽三省军政巨头会议,三省合作出师抗日,对福建事变的态度,仲元学校(胡汉民等筹办培养人才之场所)、与日本商人合作、联络北方诸事。陈融向胡报告,邹鲁因局势僵持不下,愿联合南京内外的文武力量,撇开陈济棠另寻出路,“为整个之进行”,其理由是“一、相离政治不宜太久;二、处此时间急迫之下,上策不行,则不得不思其次”。邹保证若事情有错,“亦渠一身担当,而与兄(指胡汉民——笔者)无涉。”这与后来邹自己在《回顾录》中的记载吻合。胡与陈同时是诗友,他们的信中有时会讨论到诗文。

第三十八册共58件,封面有“胡汉民收各方函件,邓泽如、何键、张英、杨熙绩、陈中孚等”字样。实际所收录者还包括陈群、何世桢、李晓生、刘芦隐、黄隆生、陈融等,内容涉及胡汉民派人赴湖南、湖北联络的结果,李晓生等在1935年底对南京政局的分析(结论是有利于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陈融关于广东政局的报告。其中涉及陈济棠与日本人的一段交往,陈向日方表示,在与日本合作方面,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他要求日方提供最新式的飞机大炮,以求对付蒋介石。日方极满意,当即交了大炮样本,并允许向国内索要飞机样本。

第三十九册共45件,封面有“陈协之先生致胡先生函件”题签。本册全系陈融致胡信,内容涉及对英、对日外交,五全大会,桂系态

度,福建事变,对付陈济棠的办法等等。胡汉民等元老派对陈济棠怨恨较深,曾提出集体离粤等方法,几至决裂,但环顾国内,似乎舍陈更无法生存。萧佛成有如下感慨:“党之一线生命寄于粤,吾人应竭力以维持之,最低限度亦当使其能如今之现状。某(陈济棠——笔者)局量偏浅,性吝而怯,不可太迫之,使举非常之事,即迫其以大款济人亦可不必。”实是无奈。在广东与南京的对峙中,湖南地当要冲,两方都要争取,何键采骑墙政策,他在婉拒蒋介石暗示其攻粤的信中写道:“亲善邻邦,共图建设,为吾人应办之事,任何邻省皆未发表若何异动,吾亦并未奉中央明令对邻省用兵,则我何能妄启衅端,以有负守土之责?苟不见信任,则惟有将本兼各职一律辞去,出洋一行。”

第四十册共47件,封面有“各方致胡先生函件,1932.5—1935,方声涛、覃振、程潜、冯玉祥、柏文蔚、龙云、王家烈、陈嘉佑、方振武等”字样。实际写信者还有黄滋、国民党加拿大总支部第六次代表大会、粤四全大会、邓泽如、陈济棠、谢持、杨如轩、阎仲儒、李烈钧、张钫、犹国才、郑先辛、何世桢、熊克武、程天固、邓慕韩等。内容涉及粤四全大会纷争、福建政情、广东财政困难、胡汉民欧洲之行,贵州内战等等。三十年代初,贵州军阀混战不已,影响到西南联合的进程,胡汉民等曾积极介入调停,王家烈等人还加入“新国民党”,与胡等函电来往频繁。

第四十一册共35件,封面有“萧佛成先生致胡先生函件”字样。该册内容涉及唐绍仪事件,“新国民党”的宣传、经费分配、海外党务,王宠惠、孙科的南行,剿共军事,广东政情,粤、桂、闽联合,土肥原访问广州,日本资助西南开设银行等事项。西南对日本的态度是复杂的,一面喊“抗日”,一面有“抱联日倒蒋”的侥幸。土肥原到访前,陈济棠专门召集会议,确定接待原则,大体只谈“中日之亲善,须以民族之公意为前提”,“未及剿共及反蒋问题”。此后日本愿意帮助西南建立“华侨银行”,以解决财政

困难,萧佛成等在乐见其成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从长远看,日本对中国野心不变,必亡中国而后快;就眼前看,“对彼(指日本——笔者)借款以组银行,彼必设一监视用途之机关,及推扩其在华南之商务,皆为题中必有之文章。苟若是,则门(指蒋介石——笔者)未倒,而吾人已为天下之矢矣。”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每册函电数量颇大,内容又庞杂,短短一段实难概括各册的全部内容。

三

阅读“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并非易事。由于全部函电稿系中文手书原件,纸张、字体各不相同(相当多是潦草的草书),且全无断句,许多字迹与字意不易辨清;有些电报因收译者水平有限,译电严重偏误,以至有胡汉民也觉读不通者(在旁有批注);初步的裱贴对保护函电作用重要,然有些多页信亦有前后颠倒,或完全贴乱现象,造成阅读、理解的困扰。更重要的是,时过境迁,阅读时需要对方函电往来者特定的称谓与人物关系有相当了解。迫于当时环境,胡汉民等人在往来函电中几乎对所有涉及人物都刻意用了字、号代称(带有感情色彩),如胡汉民本人除常用“展”、“展堂”、“展公”、“汉民”之外,尚用“四工”、“工”、“福”、“大福佬”、“延”等;再如陈济棠除常用“伯南”、“伯”外,尚被称“绅”、“绅士”、“申”、“爵”、“豹”、“某兄”等。这就更需特别的考订,才能读出内容的真实含义。

阅读过程中,笔者尚有两点与函电内容无太大关系,但饶有兴趣的发现:一、文如其人,每人信的风格各不相同。以往论者常言军阀粗鲁无知,可韩复榘、石友三、龙云、刘湘、王家烈、何键等军人给胡汉民的信,格式均极古朴雅致,用辞极严格工整,比一般文人雅士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是刻意雕饰,由师爷捉刀,可也能反映出一种趋向;二、各信用纸大小、质量不尽相同,但大多精致,不少[下转第52页]

去南洋办报(马为南洋华侨),后其果去了印度尼西亚。足证其言必行,行必果。另外,王竹尊及富伯平二兄亦准备离开大陆,另图发展,后王兄至香港,任职交通银行,富兄则往台湾大学任教。

在上海之团体会员集会,由王艮仲负责,王兄拿出七根金条,顶下了沪上陕西南路某号亚尔培公寓某楼,作为会友集会场所。时在沪会员有冷遹、马博庵、孔大充、刘平江、方东、王艮仲、李文杰、杨显东、葛克信、董赞尧、鄂森、高柳桥、戴克光(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之弟)、刘井西、王白云、徐雍舜、张敬礼、严宝礼(文汇报社长)等,我如在沪,亦到会参加。王艮仲兄时设计乡村建设计划,于其故里江苏南汇办有“乡村建设实验区”,并于沪上创办建设银行,发行《中国建设》杂志,颇有改革政治之抱负。会中,乃由艮仲兄将其已行及未行计划,报告诸位同仁。惟时局动荡,计划虽好,无法实施,纸上谈兵而已。会中沪上同仁亦谈及时局及个人去留问题,俱不主张再走,做流浪者。但对究竟作何计划,多数人亦心中无数。惟与会之杨显东(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一九五六年加入中共)、高柳桥二兄似与中共方面早有联系,言谈举止之间,显得成竹在胸,踌躇满志,与其他会友颇为不同。时会员张敬礼(江苏南通大生纱厂董事长,系张謇之侄)原拟将其实业迁至香港发展,为马博庵、冷遹等兄劝阻后,留在国内。张在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对于学会人事,会友咸主张暂停发展会员,俟时局稳定后,再行计划。

抗战胜利后,复员京沪,行政管理学会亦在京沪两地恢复活动,会员亦由最初之十几人,发展至七十人,并选举产生了干事会(我任干事)。一九四九年后,局势丕变,部分会友去了台湾和海外(张鸿钧、汪祖华、富伯平、王竹尊、马树礼、查良鉴、程式等),其余仍居大陆。一九四九年十月,杨显东藉赴北京开会之际,曾请示中共有关部门:是否可将该会作为一个民主党派(若九三学社)予以立案?经研究,被告知:行政管理学会成员复杂,不宜作为单独团体存在,但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各民主党派。旋解散。

[上接第73页]

人用了专门印制的私人信笺,如王家烈有不止一种“绍武用笺”,冯玉祥有以水印白菜衬底的信笺。更有甚者,杨虎城与石友三给胡汉民的信是写绫上的,美奂美仑。王家烈、杨虎城等身处穷僻的贵州与陕西,在写信用纸这样的小事上尚且如此讲究。笔者曾阅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档案,各部公文用纸极粗糙(依稀可辨未完全粉碎之麦秸),有时一篇长文前后竟用蓝、黑两种不同油墨印成。对比三十年代初期的这些信笺,令人生出不少感慨。

历史研究的发展有赖于新史料的开掘与整理。“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学术价值之高

无须赘言。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对此知之甚少,不少相关领域的史学者甚至尚不知有大批胡汉民书信存世。“藏在深闺人未识”,珍贵资料的价值难以体现,实一大憾事。这批函电稿如能以较完整的形式公开,使所有研究者得以了解并能较便利地运用,必能推动中国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的发展,实乃是学界之福。笔者计划未来几年内,将主要根据“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从事相关研究,以求在可能范围内让有兴趣的研究者共享。

[陈红民: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邮编:210093]